



新经典书系



GUOMORUO  
WENYI YU SHIXUE SIXIANG XINLUN

# 郭沫若

文艺与史学思想新论

何 刚 王海涛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郭沫若文艺与史学思想新论

何 刚 王海涛 著

(本书受到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郭沫若研究)建设计划资助)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文艺与史学思想新论/何刚, 王海涛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7-13542-0

I. ①郭… II. ①何… ②王… III. ①郭沫若 (1892 ~ 1978) - 文艺思想 - 研究 ②郭沫若 (1892 ~ 1978) - 史学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①I206.7 ②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902 号



责任编辑: 张爱彪

责任校对: 杨芸

版式设计: 三山科普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9.25 字数: 182 千字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3542-0

定价: 21.00 元

**何 刚** 1976年生，男，四川绵阳人。

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及郭沫若研究。现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秘书长等。主编出版学术著作2部，在《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索引）。主持省部级、厅校级课题5项，获市厅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

**王海涛** 1976年生，男，山东高唐人。

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1部，参编著作4部，在《江淮论坛》、《求索》、《当代文坛》、《小说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索引）。主持完成四川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1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2项、四川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2项。

## 内 容 简 介

思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

# 目 录

|                    |   |
|--------------------|---|
| 绪论 郭沫若思想研究综述 ..... | 1 |
|--------------------|---|

## 上篇 文艺思想研究

|                                     |    |
|-------------------------------------|----|
| 第一章 郭沫若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 .....            | 19 |
| 第二章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与《周易》之关系 .....         | 25 |
| 第三章 郭沫若文艺思想与钟嵘之关系 .....             | 33 |
| 第四章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            | 41 |
| 第五章 郭沫若与日本现代文学——以郭沫若与有岛五郎关系为例 ..... | 46 |
| 第六章 艺术化的两种维度——郭沫若与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同异 .....  | 53 |

## 下篇 史学思想研究

|                                                        |     |
|--------------------------------------------------------|-----|
| 第七章 “革命”与“学术”的双重变奏——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80 年 .....               | 59  |
| 第八章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                    | 68  |
| 第九章 学衡派视野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                                | 77  |
| 第十章 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 .....                               | 86  |
| 第十一章 郭沫若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 .....                           | 94  |
| 第十二章 “耻不食周粟”?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出版前后 .....                  | 112 |
| 第十三章 他者叙述与自我“作为”<br>——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之路”再析 .....     | 120 |
| 第十四章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br>——就 20 世纪 50 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 | 129 |
| 第十五章 “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动机再析 .....                   | 136 |

## 绪论 郭沫若思想研究综述

郭沫若的独特个性、多彩人生决定了他思想的丰富复杂。因而,有关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就成为整个郭沫若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百年的研究中,相关论文有1200余篇,其中绝大部分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后的三十年间。学界关于郭沫若思想的研究涉及学科众多、问题多样,主要涉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美学、文化等学科领域。下面分别从哲学政治及文化思想、美学及文艺思想、思想文化渊源和历史学思想研究四个方面对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历程作一简要梳理。

### 第一节 哲学、政治及文化思想研究

郭沫若思想是一个矛盾、复杂多变的存在,任何单一视角、单一范式的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全部问题。郭沫若思想的复杂一方面造成了研究中的歧见迭出,一方面也彰显出其自身的深邃魅力。总体上看,目前关于郭沫若思想的总括性研究还不多,且对郭沫若后期思想关注不足,与鲁迅思想研究相比,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但仍有一些著作值得关注,如谷辅林的《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永志的《郭沫若思想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谷书集中探讨了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和泛神论等问题。陈书则尝试对郭沫若思想作整体关照,涉及其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思想。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郭沫若早期思想(尤其是泛神论)的研究一直是郭沫若哲学及文化思想,乃至整个郭沫若研究中的热点。钱杏邨在《诗人郭沫若》中提出以1924年为界将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分为两期。但主要探讨的是郭沫若的诗歌而未对其思想作深入剖析。艾扬的《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郭沫若思想的最早研究文章。他认为从郭沫若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到发表《革命和文学》和《文艺家的觉悟》是他思想转变的预备阶段。1927年到1930年是郭沫若思想转变的第二阶段,到1930年发表《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章时他的思想转变才基本完成,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宋耀宗则认为对泛神论思想的否定是郭沫若思想转变的基础,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郭沫若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到1927年其思想转变基本完成(《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理解——读〈沫若文集〉札记》)。由于各方观点不一,陈永志针对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可视作对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他分析了引发分歧的原因,并特别指出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起点应是其少

年时代。但研究者在郭沫若思想转变的时间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主要有1924年说、1928年说、1927年说和1930年说,谷辅林是1927年说的支持者。他的《再谈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是在《试谈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基础上的进一步申述。他认为:1924年夏季之后,郭沫若已经基本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而他于1927年入党则是其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李保均则是1924年说的支持者。他认为:1921年到1924年是郭沫若思想发生质变的“转换时期”,郭沫若已开始初步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1924年的宜兴社会调查和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论思想“转换”期的郭沫若》)。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 and 角度不同,美国学者戴维·托德·罗伊在《从浪漫主义到马列主义1918—1924》中提出:郭沫若1918年至1924年间的思想包括浪漫主义和马列主义两种倾向,而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转向马列主义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郭沫若转向马列主义后并没有完全抛弃浪漫主义。应该说,这一看法是较全面客观的,它迥异与将郭沫若转型前后的思想截然分割的思路。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是郭沫若思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郑伯奇、谢康等触及这一问题以来,泛神论问题一直为研究界持续关注。相关论文数量多,但所争论的问题还是相对集中的。

其一是关于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时间。这包括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起止时间,即他何时真正接受泛神论思想、何时摆脱其影响。学界的主要分歧在起始时间,这与大家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来源、内涵的判定直接相关。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1914年前说、1914年说、1915年说,其中持1914年说者居多,以顾炯、黄侯兴为代表。顾炯指出:“郭沫若接受泛神论的影响,主要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留日学习期间。”(《女神与泛神论》,《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李保均则将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时间回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谷辅林就提出郭沫若接受泛神论的时间应为1915年他接触泰戈尔《新月集》的时候(《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实质上,这一分歧显示的是对泛神论不同理解,是固守其基本的意义还是将其泛化。对此,一些学者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如陈永志就将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称作泛神论思想的“潜伏期”(《试论〈女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张学植也认为:郭沫若与泛神论发生因缘是在早年阅读庄子著作时,而真正接受泛神论思想体系则是在留日之后(《泛神论与个性解放——“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持1914年和1915年二说者的分歧在于接受泛神论的起始时间:前说概略地表述为留学日本的时间,后说则明确以郭沫若接触泰戈尔《新月集》或王阳明著作的时间为标志。

关于郭沫若摆脱泛神论影响的时间,学界一般认定为1924年。傅正乾等将郭沫若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作为其无产阶级思想最终战胜泛神论思想的标志(《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创作与泛神论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

3期)。但也有人反对硬性划定下限,指出泛神论在1924年或1926年后仍对郭沫若的思想与创作有重要影响。吴定宇也认为1924年后郭沫若仍有泛神论的“遗风余波”,并未与之决裂(《论郭沫若与泛神论》,《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3期)。

其二是关于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问题。这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有中国、西欧、印度三个源头,但在对具体来源的认定及何种来源占据主导地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对此一问题的最早论述应始于蒲风,他明确指出了郭沫若泛神论的三方面来源:中国的庄子、印度的优婆尼塞图、西方的斯宾诺莎(《论郭沫若的诗》,《中国诗坛》,1937年第4期)。新中国成立后,楼栖也指出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即庄子、泰戈尔和歌德(《论郭沫若的诗》,《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但在思想解放以前,学界论及这一问题多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具体展开,其直接表现是这一阶段没有一篇专论郭沫若泛神论问题的论文。因此,陈永志《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一文的发表自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2期)。该文全面论述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内涵、影响等,着重指出了郭沫若思想的三方面来源:以布鲁诺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泛神论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古印度《奥义书》的哲学思想。他还特别指出,对郭沫若影响最深的是斯宾诺莎、《奥义书》、孔子、庄子、王阳明。其后,李保均也发表了专论郭沫若泛神论的论文。他认为,陈永志未充分肯定中国哲学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他特别强调郭沫若早年接受的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庄子)思想是其后来认同泛神论的思想基础(《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将西方哲学作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主要来源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李保均著文强调中国古典哲学对郭沫若的深层影响,虽然批评的声音不断,但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支持,至1990年代以后的相关探讨明显增多。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文化传统个性的关注与体认有关。任访秋指出应重视中国传统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认为儒道两家近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及张载、王阳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都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他的研究拓宽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范围。此后,传统哲学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受到了更多学者的肯定。

其三是关于泛神论在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及作用问题。此问题在关于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研究中被关注得较早,相关研究也较深入。谢康在《女神》发表不久即撰文予以评论,他明确指出泛神论存在于郭沫若早期思想中且对《女神》有直接影响(《读了〈女神〉之后》,《创造季刊》,1921年第一卷第2期)。朱湘分析了泛神论思想在郭沫若诗歌中的表现后指出:泛神论与自我主义并存于郭沫若的诗中(《论郭沫若的诗》,见《中书集》,生活书店,1934年版)。朱自清则肯定了郭沫若在泛神论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对传统诗歌思想内涵的突破,认为其中有两样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新东西,这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反抗的精神。”(《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

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 1935 年版) 周扬也指出了泛神论对《女神》的深刻影响, 认为“这个神在他就是自我……那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 个人主义之诗的夸张。……郭沫若是最有光芒的, 好多的作者都在他面前为之减色。”(《郭沫若与他的〈女神〉》, 《解放日报》, 1941 年 11 月 16 日)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学界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研究的日益深入, 泛神论在郭沫若思想中的地位及影响被不断强化。楼栖认为, 泛神论是郭沫若世界观的哲学基础, 是《女神》的指导思想, 是郭沫若早期反帝反封建的唯一思想武器(《论郭沫若的诗》, 《文学研究》, 1957 年第 2 期)。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或部分认同。但谷辅林等人也对此提出了持续关注与质疑, 其主要文章有《关于郭沫若前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 评楼栖同志的一个观点》(《曲阜师范学院学报》, 1963 年第 1 期)《试谈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兼与楼栖同志商榷》(《文学评论丛刊》第 4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郭沫若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 8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等。他认为: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从潜伏到暴发有一上升过程, 不是处在不断削弱和逐步消亡的状态中, 也不是他当时战斗的唯一武器, 革命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才是他战斗力量的主要内因。他同时肯定了泛神论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王大敏认为: 郭沫若早期世界观的核心不是泛神论, 而是战斗的唯物论, 但泛神论对郭沫若早期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均有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郭沫若早期思想、诗歌和泛神论的关系》, 《四川大学学报》, 1978 年第 2 期)。李保均也提出: 泛神论不是郭沫若早期创作的核心思想, 在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大量诗作并未反映出泛神论的影响且其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作品》, 《文学评论》, 1979 年第 2 期)对泛神论地位及作用问题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了“去泛神论”的倾向, 出现了一些对郭沫若早期思想的新界定。陈晓春在这一时期较早对郭沫若早期思想进行了重估。他认为: 泛神论无力概括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 在泛神论掩盖下的以生命为本位的、非理性主义的“生之哲学”才是郭沫若早期思想的核心(《在“泛神论”的背后——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再探》, 《郭沫若学刊》, 1994 年第 3 期)。蔡震也指出: 泛神倾向与生命意识在郭沫若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 生命意识在郭沫若早期创作中有明显体现(《“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关于生命哲学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综上所述, 《女神》发表以来, 郭沫若泛神论研究的成果日趋丰富、研究视角日趋多元、研究思路日趋开放, 充分显示这一研究与中国现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紧密相联。关于研究与研究所依托的语境之关系,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研究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我们期待着对这一研究更深入的反思。

除以上几方面外, 研究者也涉及郭沫若的文化观、人格精神、民主主义思想等方面。张积玉的《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较全面地论述了郭沫若的传统文化观、西方文化观和新文化建设观。其深度虽不及之后的专门研究, 但其对郭沫若文化观作整

体关照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在郭沫若人格精神研究方面,黄侯兴的《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深入剖析了郭沫若一生创作中呈现出的“青春型”的文化品格,在郭沫若人格精神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价值。蔡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抒写的人生——关于郭沫若的浪漫精神》则进一步深化了对郭沫若人格精神的研究。该文指出:浪漫主义是郭沫若的精神本质,其内涵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践表现是创造精神。当然,以上对郭沫若人格精神的研究还是局部的、有限的。相较之下,桑逢康的《郭沫若人格》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较为全面的专论了。

此外,刘悦坦的《“球型天才”与原逻辑思维方式——再释郭沫若及其泛神论》涉及以往研究中极少关注的郭沫若的思维方式问题,颇有新意。伍世昭的《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新说》则提出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自我论”,而非“泛神论”或“生之哲学”。其说虽不足以颠覆成说,但足备一说。

## 第二节 美学及文艺思想研究

美学及文艺思想是郭沫若思想文化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但与对郭沫若哲学及文化思想的研究一样,研究者大多关注郭沫若早期思想,对郭沫若后期思想关注不够。究其原因,固然与郭沫若自身思想变化的实际有关,但也与研究者的单一视角和成见有关。诚然,郭沫若早期的美学及文艺思想相对丰富多元,研究和阐释的空间也较大,但郭沫若的美学及文艺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整体,简单的时段式研究无法揭示其全貌,也不利于系统总结其经验教训。同时,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虽然有关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众多,但真正有创新价值或能深化相关研究的并不多;其二,有关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与中外文化关系的文章将在“思想文化渊源”部分加以述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学界有关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的研究文章颇多,但系统全面的研究却很少。我们所谓全面主要指:要涵盖郭沫若早期和后期的美学及文艺思想,而非顾及一面而不及其余,要用历史的与辩证的方法进行研究;要兼及其理论表述和创作实践,而非仅注重理论而忽视创作;要兼顾郭沫若在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甚至考古等诸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美学及文艺思想,而非拘泥于某一特定领域。当然,如此要求或显苛刻,但惟其如此方能深入揭示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的深蕴。在这方面,黄侯兴的《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较有代表性,魏红珊的《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前书是迄今较少的关于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著作,后书所论及的郭沫若历史和考古著述中的美学思想则罕有人涉足。此外,如傅正乾的《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面集中探讨了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深化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

学界对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相对集中而深入的研究还是在新时期后。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多是在探讨郭沫若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时涉及,而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研究数量有限且带有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大多倾向于从革命历史的发展进程解读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的演变,而批判其早期思想的唯心主义也成定式。新时期后的研究逐步摆脱了这一倾向,研究的纯度逐渐增强,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尹在勤的《性情必真——沫若诗论的核心艺术见解》和易明善的《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即是较早摆脱以往研究框架的文章。尹文指出“性情必真”是贯穿郭沫若全部诗论的核心,对其早期诗论不应简单否定。易文则肯定了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更详细地论述了其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几方面具体主张。林恭寿的《论“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文艺观》则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更鲜明地肯定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可视为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研究观点分歧及评价分化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研究基本上将其早期文艺思想界定为唯心主义的,认为其作用是消极的,而刻意拔高其后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思想,极力肯定其唯物主义特色。这种状况在新时期之初的研究中仍未有根本改变。钟林斌《论郭沫若早期文学主张的特点及内在矛盾》肯定了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观的价值,但仍纠结于唯物与唯心的哲学预设,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时期研究的时代特色。文天行的《郭沫若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专门论述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他认为,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在“皖南事变”后进入了新阶段,现实主义文艺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该文与钟文一样略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相比之下,蔡震的《论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的“主情主义”》和黄曼君的《人·泛神论·浪漫主义艺术——郭沫若前期诗歌思想与艺术综论》则明显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回归到纯粹学术研究的轨道上,也因此显示出难得的理论深度。蔡文主要讨论了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形成条件和历史作用,是迄今探讨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较有理论深度的文章之一。黄文则结合泛神论探讨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剖析了前者对后者的深层影响,将这一问题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对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体现为创新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增强。孙玉石的《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虽然探讨的仍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论问题,但将其上升到了本体论高度,论及诗的本源、原则等方面,研究的系统性特征明显。曾永成的《郭沫若关于“文艺的科学”的构想及其对美学理论建设的当代意义》则涉及以往研究中忽视的郭沫若的文艺科学思想,也是对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系统性观照。

相对于郭沫若文艺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界对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其实,不少学者在论及郭沫若的文艺思想时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其美学思想,但真正的专门研究则起步较晚。鄂基瑞、王锦园的《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探》和王世德的《论郭沫若的美学思想》是较早发表而颇有代表性的文章。前文主要论述了

郭沫若关于艺术起源、艺术与社会生活、诗论、天才观、美的类型等问题的认识。后文着重分析了郭沫若表现自我的诗歌美学思想和“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美学思想。二文论述都较为全面，相形之下，前文更贴近美学学科属性，而且特别论及了郭沫若对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创新性和拓展性的研究并不多见。龙泉明《评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观》着重探讨郭沫若的诗歌美学观点及其独特价值，认为其“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主张的核心是“感情”问题，其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创造以及想象与灵感的观点具有重要价值。该文关于郭沫若诗歌美学的阐发对认识郭沫若的美学思想颇具参照价值。吴功正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世纪型开拓者——为郭沫若诞辰100周年而作》所论及的郭沫若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贡献及其中体现出的美学观是之前研究中未曾涉及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渊源研究

郭沫若的思想来源极为复杂，这在成就他的思想的丰富深邃的同时，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为，要深入理解他的思想内涵并对之作出切中肯綮的评价就要追溯其思想的诸多来源，而这无疑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有难度的，但也为郭沫若研究突破固有学术疆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事实上，对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初创期就开始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化热的出现，郭沫若思想研究才有了明显转向，即转向从文化学、比较文化学、比较文学、比较美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当时，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先后组织了几次大型的专题研讨会，如《郭沫若与中外文化》（1987年）、《郭沫若与传统文化》（1990年）、《郭沫若与中国科学文化》（1992年）、《郭沫若与儒家文化》（1993年）、《郭沫若与当代文化》（1994年）、《郭沫若与抗战文化》（1995年）、《郭沫若与乡土文化》（1996年）、《郭沫若与世界文化》（1997年）等。与此同时，在郭沫若思想研究方面涌现出一批颇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如税海模的《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较早探讨郭沫若思想及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著作。这些论著以中西文化为参照较深入地挖掘了郭沫若思想的内涵，揭示出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一些问题。此后，文化热虽然逐渐消歇，但此类研究却一直延续下来，成为郭沫若研究中成果较为丰硕、较有特色的领域。进入新世纪（21世纪）以来，吴定宇的《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税海模的《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的出版更是进一步深化了此一领域的研究。

在众多研究文章中，探讨郭沫若美学及文艺思想渊源的文章占据了相当份额。这固然是因为美学及文艺思想是郭沫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也

与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有关。因为,多数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者的主要知识储备来自文学、美学方面,而对其他学科领域相对生疏。研究队伍学缘结构的这一问题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选题领域相对集中,缺乏新意乃至重复论述的文章较多。尽管如此,其中仍不乏有理论深度和广度的文章。王富仁、罗钢的《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和伍晓明的《郭沫若早期文学观与西方文学理论》就是较早出现的从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角度探讨郭沫若美学和文艺思想的文章。此后,同类文章众多,但大多没有超越二文。王富仁、罗钢的文章全面论述了郭沫若早期美学观与西方诸多美学家的思想关联,指出郭沫若对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接受是多样的、零碎的,但自有其体系。该文的价值在于梳理了郭沫若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的知识谱系,其主要问题在于所论及的克罗齐、柏格森等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周海波就在《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更准确地将柏格森、弗洛伊德归为现代主义文论家。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多是单独论述郭沫若的美学或文艺思想与西方某一派或某一美学家、文论家思想的关系。此类文章全面性、系统性虽不及王富仁、罗钢的文章,但在其基础上探讨了某些更具体的问题,如聂国心的《酒神精神与郭沫若早期诗论》讨论了郭沫若早期诗论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关系;王世德的《郭沫若与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思潮》分析了郭沫若早期文艺美学思想与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作出了新的阐释;刘光宇的《论郭沫若早期对弗洛伊德文艺美学的信奉和超越》论述了郭沫若对弗洛伊德文艺美学思想的借鉴和改造;魏红珊的《郭沫若与表现主义》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郭沫若接受表现主义的背景、原因、内容等问题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中国传统根源,并对此做了较充分地挖掘和阐释。与对郭沫若与西方美学和文论家思想关联的研究相比,学界对郭沫若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家思想关联的研究要晚一些。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是郭沫若的美学和文艺论著中的西学痕迹较为明显,遮盖了其同样深厚的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的根基。应该肯定的是,新时期以来这一研究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蔡震的《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我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就较早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文论对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该文指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论主张与中国文学的“言志”传统及庄子等人的文论思想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杨胜宽的《郭沫若与文学理性传统》则集中论述了郭沫若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宣传鼓动性的主张与儒家所倡导的文学理性传统的关系及对其创作造成的负面影响。总体上看,此类研究文章较深入地探讨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传统渊源,但也存在对传统文论体认不深和对其间关联梳理流于表面的问题。而综括起来看,已有研究对郭沫若与中西美学和文论传统的研究是隔离的,尚缺少综括式的研究,对郭沫若如何融汇中西方两种理论资源的理路还缺乏明晰的揭示。伍世昭在其《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中触及了郭沫若如何化合中西文论的问题,但论述也还不够深入。其实,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可以参考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研究思路。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整合各类材料研究郭沫若接受和阐发中西文论传统的学理背景、接受心态和视角、接受和融汇的深层机制等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真实地回归历史场域,达到在现代文论和美学建构的语境下深入理解郭沫若郭沫若自身美学及文艺思想的目的。

此外,学界对郭沫若思想渊源的研究还涉及中西文化的其他层面,也有总体上的研究。例如魏建的《传统“文人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对“五四”时期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一种把握》在中外文化的双重视域下分析了郭沫若的“文人意识”的转化,指出他在“五四”时期一直处在传统的“社会个体”向现代的“个人”的过渡中,他的理性思辨与实践行为之间的矛盾是由其文化心理中中外两种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季进、丁兴标在《创造在整合与阐扬中完成——论郭沫若中西文化观》中较深入地分析了郭沫若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取向,认为其早期价值观的中心意向在于“寻求中西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沟通和整合”,其核心是儒家文化,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则转向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章特别提出:郭沫若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典范。这就比一般性地研究郭沫若思想更胜一筹,是值得今后的研究借鉴的。此外,如黄侯兴的《郭沫若文化视野散论》、谢保成的《简述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秦川的《略论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陈晓春的《“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试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收入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从不同视角对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作了较为独到的探究。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郭沫若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郭沫若的思想确与儒家文化关系紧密,儒家文化在其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在早期对郭沫若思想的研究中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故需要加以弥补;三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熟悉,便于从此一方面找寻到更多的研究增长点。在此类研究论文中,税海模的《试论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儒道积淀》、邓牛顿的《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李怡的《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与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较》等均较有创见。税文指出郭沫若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交织着儒道两种思想的矛盾,这对其思想及创作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邓文梳理了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对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并进而探讨了郭沫若“多变”的深层原因。李文则从人生理想、社会实践和生命意识等方面对比,分析了鲁迅和郭沫若在对儒家文化时的异同,指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鲁迅是择取型的,郭沫若是承传型的。该文观点或可商榷,但所采用的比较论证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毕竟,郭沫若与同时代人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人为地抽离不利于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质言之,包括郭沫若思想在内的整个郭沫若研究需要多维视角切入、多重话语的碰撞。

此外,对郭沫若思想渊源的研究还涉及郭沫若与宗教文化、地方文化、各类哲学思潮等方面。其中有不少研究文章视角新颖、观点独到。例如税海模的《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谭继和的《郭沫若与巴蜀文化》、王本朝的《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王骏骥的《试论“五四”时期郭沫若对中国传统形上哲学的体认和追求》、陈晓春的《从乡土、家庭的“边缘性”看郭沫若叛逆性格的必然性》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一一胪列评述了。

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郭沫若思想文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涉及许多之前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的问题。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诸如研究领域分散导致的缺乏深度、片面追求创新而简单勾连、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了解不够而流于浮泛等。由此凸显出郭沫若研究者亟待解决研究心态、学理背景优化、学科资源整合等问题。尽管如此,但在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的郭沫若思想研究,乃至整个郭沫若研究可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第四节 郭沫若历史学思想研究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文化与学术成就。自郭沫若从事学术研究及社会实践起,对他的评论与研究即随之亦起,参与的研究者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亦愈发地广泛,誉之者众,毁之者亦众,可以说形成了过去近百年中国文化与学术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近百年里,有关郭沫若史学的研究,随着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发展和中國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轨迹,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如何认识、评估、利用这一丰富宝贵的学术资源,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保持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是摆在当下郭沫若史学研究学界的思考课题。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做之序中有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对过往学术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和反思,为学术传承与开新所必需。它既能够反映以前研究的总体学术风貌,探索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更能够在学术传统积淀的基础上思考新时代学术研究方向和进程,让其以更加稳健的步伐,走向科学和完善。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宗旨,我们对于过去近百年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然后选其精要。它直观展现了既往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总体风貌,流变轨迹,也会给研究者提供既丰富扎实,又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让他们能便捷地走进其中,并站在前辈学人的肩膀上实现学术的超越和突破。

对于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无疑是其两千多年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前半期,史学各派并起,争流竞进,异彩纷呈。众多史学名家和学派提出了繁复庞杂的史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也正是在与其他流派史学思想的撞击、论辩和互渗的过程中，最终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转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确立了其在中国史学的正统地位。作为唯物史观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郭沫若及其史学成就自然为各派所瞩目。众派史学家对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进行了视角各异，褒贬有别的评论，这些评论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学术批评的重要组织部分。审视众多学派视野中的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唯物史观史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复杂学术面相，以及人们对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具体研究的价值估量。同时，郭沫若及其唯物史观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尤以新历史考证派为主）的论辩、竞进，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现代嬗变的诸多面相，分析和彰显了郭沫若在其中奠基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重大贡献。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来说，也有内部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之间的论争。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郭沫若在中国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主张上多有不同，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鸣。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争鸣使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史学家不断修正和完善各自的古史研究体系，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了正统，掀起发展的崭新篇章，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历史研究的整体科学水平也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时，历史学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围绕着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史学家相互间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讨论，这些讨论构成了“文革”发生前中国史学界的基本内容。而对郭沫若史学主张的评价讨论是其中的主要组成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讨论概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是因为郭沫若在这些争鸣中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倡导者，并适时地将这些讨论不断地向前推进。例如，在1960年前后，郭沫若发表了关于曹操、武则天等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评论文章和历史剧，在史学界引起了热烈论争。由替曹操、武则天翻案开始蓬勃地兴起了重评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而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高潮。另一方面，郭沫若在1952年所作的《奴隶制时代》中最终完善确立了“战国封建说”。在当时各家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官方为了保持历史教材的一致性，大中学的历史教学都曾采用此说，因此在国内流行甚广，影响很大。关于中国古史分期而出现的“三论五说”中的其他各说，都程度不同地与郭沫若的史学主张及其“战国封建说”进行了讨论争鸣。在阐述自己的古史分期主张时，他们都不可能绕开郭沫若“战国封建论”而径直说开去，而总是首先要对其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评判，以期在阐述自家的主张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针锋相对。在这一时期的史学讨论背后，其实蕴涵着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包括“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论带史”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以如何估计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帝王将相，和农民阶级及其起义为主），等等。这些问题除了具有其本身的学术意义之外，由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所赋予的浓厚意